



文史从谈

浙江省高校重点教材

刘光永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文史丛谈

刘光永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丛谈 / 刘光永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39-2499-7

I.文... II.刘... III.文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178 号

责任编辑 易 文

装帧设计 王 坚

文史丛谈

刘光永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0.25

插页 1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499-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言

努力做文理兼通、“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寄语当代大学生

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面有美学。

——钱学森

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福楼拜

二十一世纪就是科学和艺术会合的峰顶!

——李政道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应当是大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培育、自我修炼的殿堂;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应当努力做文理兼通、“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古今中外,大师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大多是文理兼通、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提倡“君子不器”,提倡知识结构的均衡合理,提倡优秀人才的多才多艺与强大的适应、应变能力。俄国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与苏霍姆林斯基所见略同,他多次对德国的大学生发表演讲,一再强调知识结构的全面性、合理性问题。他曾说:

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宠物,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是相互补益、相互滋养的。

分别创建于1168年和1209年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开始阶段所设学科均有艺术、音乐等课程,人文艺术教育比重很大。

中国古代的大哲人庄子在《天下篇》里提出一个学术文化研究纲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把“判美”与“析理”看做两个不可分割、相得益彰的方面。而哥白尼1543年在其公布的《天体运行论》中,第一句话就强调美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分

割,甚至将美学视为他研究天文学的出发点和最高的精神追求。其原话是这样的:

在哺育人的天赋才智的多种多样的科学和艺术中,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用全部精力来研究那些与最美的事物有关的东西。

哥白尼说,他之所以用“日心说”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是深信自己的体系是最完美的。美感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它常常能从整体上一下子把握事物的本质。

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相互补益、相互滋养,不仅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且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人的大脑本来就是一所综合性的信息处理的加工厂、研究院。左脑专司逻辑思维,右脑专司形象思维和综合。如果一个人长期只进行一种思维,长期只用一边脑器官进行思维,很容易产生大脑老化、功能滞障和衰退,或者导致心态失衡、心理畸形。据说大科学家牛顿患有神经过敏症,大画家凡·高患有抑郁症,估计与他们长期只进行一种思维不无关联。

科学史和人类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例证: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相互补益、相互滋养,的确对于人的创新能力有着很明显的强化作用。近代以来,人文学者借助自然科学的实证原则的成功例证,不胜枚举。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学、计量历史学,显然是科学的质量原则启示的结果。反之,自然科学也往往在人文科学中得到启示。如达尔文在创立进化论的艰苦探索阶段,百思不得要领。某日,他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突然想到在生存竞争的条件下,有利的变异保存下来,不利的则可能淘汰。于是,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变得明晰起来。无独有偶,进化论的另一位发现者华莱士一次在病中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也联想到可以用适者生存的观念来部分解释进化现象。达尔文与华莱士不约而同地从人文科学著作《人口论》中获得灵感,是人文科学滋补自然科学的典型例证。

美国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也非常具有说服力。

“零点项目”1967年创立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立项起因是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研究对象是艺术教育——艺术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营养、助推作用。

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但却整整落后于美国四年。美苏两霸于是展开第二轮科技竞争——空间技术的竞争。为了抢先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苏联使了个障眼法,假装一系列失败,麻痹了美国,于1957年11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翻开了人类星际发展的历史。美国人大吃一惊,奋起直追,但还是落后了整整83天。虽然只落后了83天,但实际上就等于落后了一年,因为美国的人造卫星上天时,时间已经跨入1958年。

美国人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经过痛苦的反省,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是先进的,但人文艺术教育落后,美苏之间科技人员的不同文化素质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

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各方面的论证。

首先,在文学方面,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艺术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俄罗斯人总爱这样说,他们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民族就无愧于全世界了!当然,除了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冈察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大批不朽的伟大作家。还有十九世纪文学史上的怪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犹如美术界的凡·高,作品有极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次,在音乐方面,民族主义音乐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音乐流派之一,但其代表人物除了捷克的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等人外,差不多都是俄国人。如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的作者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交响乐曲《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作者鲍罗廷,管弦乐《荒山之夜》和钢琴曲《图画展览会》的作者穆索尔斯基。这三个人都属于作曲家“强力集团”的成员。另外还有被称为俄罗斯古典音乐之父、歌剧《伊凡·苏萨宁》的作者格林卡。当然,最重要的当推柴可夫斯基,他的作品内容深刻,形式完美,旋律优美,表现细腻而富有诗意,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音乐史上无人企及。

再次,在美术方面,行家说,十九世纪的美国名画,人们举不出十幅,可是俄罗斯名画,举出一百幅也还绰绰有余。巴黎被称为艺术之都,有罗浮宫,美术史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思潮皆诞生于此。全世界唯一能与之匹敌的,只有莫斯科的特列嘉柯夫画廊。

文学、音乐、美术三个方面,美利坚都不如俄罗斯。除了德莱塞和杰克·伦敦等少数几个作家外,这一时期美国的著名音乐家有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但一查家谱,全来自俄罗斯。其实,用不着查家谱,从姓名上也能看出来。

“零点项目”自设立以后,投入上亿美元,参加研究的学者有上百人。他们在一百多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做实验,有的从幼儿园起连续进行数十年的追踪对比,出版了数十本专著,发表了上千篇论文,对美国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4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

人类文化史上的无数事实表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相互补益、相得益彰的。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不仅对诗词歌赋、国画京剧都有特殊的爱好,近年来还致力于倡导科学与艺术相互渗透、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密切协作,甚至别出心裁地请多位画家“画科学”。为什么要“画科学”?李政道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科学和艺术不可分割》的文章,论证两种“艺术”形式和两种思维形式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

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

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尽管自然现象本身并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存在,但对自然的抽象和总结属于人类的成果,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

可以说,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的互相滋养,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相得益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互为用,正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

我们知道,许多科学家都是酷爱文学与艺术的。爱因斯坦一再强调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由数学公式组成。”他酷爱音乐,几乎每天都要拉小提琴,特别是在他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和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那优美并充满想象力的旋律,对其创造性思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滋补作用。他常常和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一起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他拉小提琴,普朗克弹钢琴。没人知道两位大科学家一起演奏时交流过哪些思想,但人们可以猜想得到,那当儿,科学美与艺术美的微波,一定会在他俩所形成的精神磁场之间,高频率地双向流淌、激荡!爱翁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有人曾问他:“死亡,对你意味着什么?”爱翁说: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再也不能欣赏柴可夫斯基那美妙绝伦的乐曲了!似乎这位“人类级”的科学泰斗活着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音乐,为了艺术!

我们中国也有一批热爱人文艺术的科学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酷爱音乐,称得上音乐行家。人们也许难以想象,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不是作曲家马思聪写的,而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写的。1920年他在巴黎留学期间,思乡心切,激情喷涌,一挥而就,写了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七十年后的1990年,当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陈钢捧着刚刚发现的这首曲谱时,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样立意深邃、层次清晰、调性规范的乐曲,竟然出自一位地质学家之手。

李四光早年学的是建筑,后来研究构造地质,又创造了地质力学,用力学原理来解释、猜想、推断地壳的结构。或许正是那悠扬婉转、令人销魂荡魄的小提琴独奏曲,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文艺术佳作,启发了他的科学思维,滋润了他的壮丽人生和科学伟业。

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与李政道所见略同,也强调美学对科学的启迪、滋润作用: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面有美学。

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他会吹圆号,还会弹钢琴。钱学森和李四光有一个共同的人生体验,或者说有着同样的个人生活的幸运:李四光夫人是音乐家,钱学森夫人也是音乐家。他们二位都乐不可支地坦白:自己一生科学研究的精深造诣,与夫

人的艺术修养及其营造的艺术型家庭氛围密不可分。钱学森八十岁时，国家授予他“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钱学森在致答词时曾说：是夫人的艺术氛围滋润了他的心田，给了他无数的科学灵感，使他少走了许多弯路。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李政道接过福楼拜的话说：“二十一世纪就是科学和艺术会合的峰顶！”

上面这些话，是六年前引发我决意为理工类大学生开设公共选修课“文史丛谈”的基本诱因，也是出版这本“人文素质教育”教材的初衷。

本书大体由三个“知识丛”组合而成：一是大唐文化系列，涉及唐都长安的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大唐的诗风与诗韵，唐诗中的酒文化三个专题。这是编者当年在长安故地从教十八年间业余爱好的部分结晶。二是历史人物评述，涉及古代的白居易、苏轼，近代的李鸿章、张謇、梁启超、胡适六个人物，是我多年来喜欢品读历史人物的一点记录。三是中外社会变革史，包括总论性质的“中外变革史上的人与事”和“清末改革的历史反思”两个专题，是我上个世纪最后十余年间研读中外社会变革史的一点粗浅体会。三者之外，“唐宋时代的士人心态与学术转型”，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边缘性的题目，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度与辐射力的大题域，本书中的大部分话题都与它有横向或纵向、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唐宋时代被人们视为中国由上古到近代、由古典文化到近代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了解唐宋两代的文化风貌及其转变，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艺术的特性和精髓，具有典型意义。

大唐文化这个部分，主要是想通过对唐文化这一我国古典文化的典型代表和经典板块的粗线条的勾勒和介绍，提高同学们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增强大学生欣赏古代文化与艺术的能力。这部分虽然文字有限，但涉及面较宽，比如，唐代自然天成的陶瓷生产工艺、巧夺天工的丝绸纺织技术、群星璀璨的绘画艺术、名家辈出的书法艺术等等。

历史人物评述这个部分，虽然主要涉及的只有六个历史人物，但他们都具有一定典型性：白居易艺术造诣独步一时，创作路径和艺术风格与李杜相比别具风情。苏东坡号称“文学全才”，诗词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而且白居易和苏东坡又都在杭州任地方官，对西湖文化积淀具有特殊而深远的影响。李鸿章作为中国“五千年大变局”中典型的“问题人物”，在他的身上负载了太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荡碰撞的历史聚焦点，对他的解剖，非常有助于培植历史地看问题、辩证地全面地知人论世的能力。“末代状元”张謇堪称我国第一代实业家，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实业经营、社会活动和政治追求，本身就给人诸多启迪，而且可以通过他这个历史人物作参照系，加深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格局及其演进、变迁规律的体认。梁启超、胡适作为近代中国两代启蒙思想家

与学术大师,他们的思想体系和学术造诣,曾经在近现代影响了几代人。梁启超号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胡适则号称“自由主义大师”。他俩的思想应当被视为中华民族由传统到现代的驳船与桥梁;他们的治学方法,学术追求,以至为人处世之道,都有值得后学汲取和借鉴之处。

中外社会变革史这个部分,主要是对人类社会变革史鸟瞰式的扫描。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时代、改革的国度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攻坚阶段,大学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有生力量,了解国家社会当下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自是本分所系、使命所关;而加深对“冷却了的现实”——人类社会变革史的解读与体悟,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胡适当年任北大校长时,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援引他所推崇的易卜生的话告诫北大的同学们:年轻朋友啊,“眼下第一大事是将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培养一点文史方面的兴趣,增强一些人文艺术方面的营养与修养,培养一些人文情怀和“人类关怀”,对于“将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肯定会有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3.《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4.《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5.曹聚仁著:《中国学术思想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 6.李泽厚著:《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7.[美]墨子刻著,颜世安等译:《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8.[美]威廉·弗莱明著,吴江译:《艺术与思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 9.余虹著:《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10.[日]池田大作著,铭九译:《我的人学》(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说明:各章参考文献中,凡加有※号者为撰写该章时重点参考过的著作,特此向各位作者表示感谢。

目 录

引言	1
诗的王国——唐都长安的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	1
大唐的诗风与诗魂	18
唐诗中的酒文化	38
唐宋时代的士人心态与学术转型	53
杭州刺史白居易	87
千古风流苏东坡	100
“中国十九世纪之前之英雄”——李鸿章	126
矢志“实业救国”的末代状元——张謇	159
“笔底常带感情”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	190
“属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师——胡适	231
中外变革史上的人与事	266
清末改革的历史反思	280
生当作人杰	302
后记	316

诗的王国

——唐都长安的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

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

——[法]谢和耐

在整个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

——[英]威尔斯

那时的中国文化，充满着宽容精神。

——[美]费正清

唐都长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当时世界文明中最璀璨诱人的瑰宝，也是名副其实的“诗的王国”、“艺术的王国”。

一、唐都长安城简说

唐都长安是我国封建时代都市建设的集大成之作，在世界文明史上，或许只有古罗马城可与她媲美。

唐都长安城是在原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增建而成的，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围护皇城和宫城，其南北长 8651.7 米，东西宽 9721 米，城周 36.7 公里，面积 84 平方公里，相当于今西安城（即明城垣，面积 8.71 平方公里）的 9.65 倍。

外郭城以宽达 155 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相等的两部分，东部属万年县，西部属长安县。城内设南北大街十二条，东西大街十四条，其间列置坊市，作为百姓居住和生活处所。除东、西两市所占的四坊和东南角因曲江池没有设坊的两坊之地外，共有一百零八坊。各坊的大小和坊门的开设均有统一规定，皇城南面的三十六坊，各设东西两门，其余各坊均设东西南北四门。整个城市呈现棋盘式的方正格局。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是对唐都长安城方正格局的朴素而又生动的写照。

外郭城东西南各开三门。北城垣由于宫城占了东半截，本来无法开三门，但为了凑够十二道城门，仍在宫城西边开了三门。长安城南面正中为明德门，设五个门

洞，上置“五观”，即五个城楼。其余各门都是三个门洞，上置“三观”。

说到长安的城门，使人自然联想到唐诗中许多有关“青门”、“青绮门”的诗篇。如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别酒青门路，归轩白马津”，温庭筠《早春浣水送友人》“青门烟野外，渡浣送行人”，白居易《长安春》“青门柳枝弱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

几乎所有在唐都长安生活、旅游过的诗人，都吟咏过“青门”或“青绮门”，可是唐都长安城十二门中并没有叫做“青门”或“青绮门”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与汉长安城的东门有关。唐人沿袭汉代的习惯，仍把东城门（唐通化门）称为青门，或青绮门。因城门以东 3700 米处为长乐坡，这里有驿站，就叫长乐驿。出了长乐驿站，便是通往关东的大道，人们常常在这里依依惜别，为朋友送行。所以唐诗中凡提到“青门”、“青绮门”和长乐坡的，往往与送别有关。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白居易更写了一篇《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充满惆怅之情地吟道：“终日坡前恨离别，漫名长乐是长愁！”是对这一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离愁别绪的典型描述。这些著名诗人的深情咏叹，为雄浑壮观的长安城增添了更加诱人的文化内涵与诗情画意，令人更加流连忘返，神迷魂销！

当时长安城内居民在一百万上下。这一数字是根据新、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大致推算所得。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载，显庆元年（656）四月，观看玄奘迎接唐高宗给慈恩寺制的慈恩寺碑典礼的长安居民有百余万人。《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说：“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唐诗中吟咏长安的篇章也有涉及人口数字的。如韩愈《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遣兴十首》：“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也说明长安有百余万居民。

二、唐都长安的经济

（一）高度发展的手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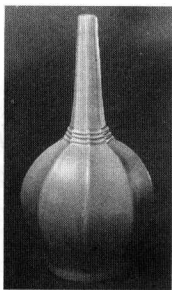
唐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手工业产品可谓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其手工艺术可谓巧夺天工，美妙绝伦。这里仅以陶瓷、丝绸两业为代表，窥其一斑。

自然天成的陶瓷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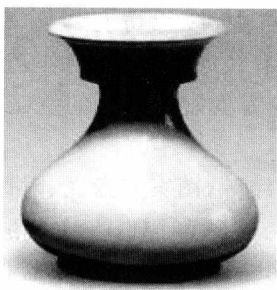
唐代制瓷业，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成熟阶段，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瓷土的选择、釉色的种类、使用的匣钵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唐代的瓷器主要有青、白两色，白瓷以邢窑为代表，青瓷以越窑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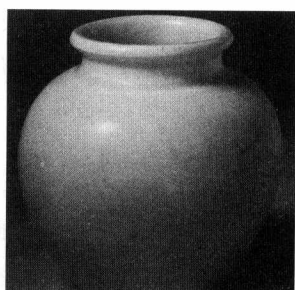
越窑青瓷



唐秘色八棱净水瓶



唐代白瓷



唐邢窑白釉罐

陆羽在《茶经》中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种瓷类的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瓷不如越瓷，恐怕只能算是嗜茶人的一孔之见。若以质量定优劣，则邢瓷与越瓷可平分秋色，品位不相上下。陆羽还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这个比喻倒是恰如其分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是青瓷。西安东关羊头镇发掘的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的李爽墓，出土了一件越窑青瓷瓶，灰胎、青釉，釉色纯青，晶莹透亮，光彩照人。正如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描绘的那般楚楚动人：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打开烧制青瓷的窑口，但见无数秋天的风情雨露、千峰万壑的自然美色，都熔为一炉，向你扑面而来，真是乐不可支、美不胜收！这样冰清玉洁、精美绝伦的青瓷酒杯，在什么时候、与什么人、喝什么酒，才与她那天仙般的资质相匹配呢？诗人的回答很明确：“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陆龟蒙说只有在皓月当空、万物澄明的中秋之夜，在这精美绝伦的青瓷酒杯中盛上世界上最好的美酒(沆瀣)，然后将魏晋时期嗜酒任性、放荡不羁的大名士嵇康请出来一块畅饮，才与这冰清玉洁、精美绝伦的青瓷酒器相匹配！

为什么将最好的美酒称为“沆瀣”呢？“沆瀣”在唐以前本来是褒义词，指的是秋夜花瓣上的露水——古人认为那是最纯洁、最沁人心脾、最令人心旷神怡的饮料，比喻为世间最好的美酒。“沆瀣”变为贬义词，也在唐代，但时间应该在陆龟蒙作此诗之后。据说某年唐朝举行科举考试，考生崔瀼事先给监考官崔沆行了贿赂。崔沆便在考试时放任崔瀼作弊，公然破坏国家神圣的考试制度。后来事情败露，人们批评他俩狼狈为奸、伤风败俗。有人写了对子“座主门生，沆瀣一气”予以抨击，从此，“沆瀣”有了一层贬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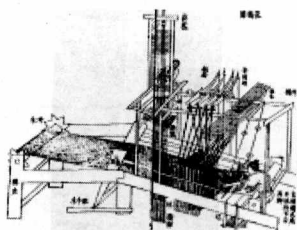
巧夺天工的丝绸纺织工艺

在封建时代，最高水平的生产工艺，自然是为皇家服务的。唐朝宫廷内设有“织染署”，专门负责皇帝、皇后、太子及群臣的服饰，织染锦、罗、绸、缎、纱、绢等。

据史书记载,织染署所领作坊中,绫锦坊有巧儿 365 人,内作使有绫匠 83 人,掖庭有绫匠 150 人,内作巧儿 42 人。据说杨贵妃得宠时,专为贵妃院做工的绣工就多达 700 人。

织染署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等,图案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芝草、对雉、斗羊、翔凤等,文彩绮丽,光艳照人。特织品的制作设专官监视,以防其工艺流传宫外。每当掖庭织锦时,特给酒羊犒劳。每年夏历七月七日,祭祀乞巧,同时举行织绣技艺比赛。这些工匠是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并经严格训练的,因而一个个技艺超群,所生产的绫罗与服饰,每每独领风骚,盖世无双。史书记载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有一件稀世“毛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见《旧唐书·五行志》与《资治通鉴》中宗景龙二年)。真可谓美妙绝伦,巧夺天工。

唐朝除在宫内设坊监造外,还由江南等地大量贡奉,并在长安城内出售大量高级丝绸绫锦。其花色品种有绯绫、乌眼绫、绣叶绫、水纹绫、吴绫、轻容、縠绫、衫罗、宝花罗等数十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上去像披了一层薄雾,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太平广记》说,轻绢一匹长达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



中国古代提花机(结构图)



唐漏版狩猎纹印花纱



出土于新疆的唐代朵花

丝绸花纹,有织花、绣花和印花的不同。縠绫上的花是织花。元稹的《阴山道》描述的是织花工艺:

挑纹变缉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縠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

元稹的《织妇词》又说:

缣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其工艺流程之复杂繁难,可见纺织女工的辛勤劳苦。

元稹只偏重于生产工艺方面的观察与描述,但縠绫到底美不美呢,他没提。白居易的《縠绫》篇,则描画了縠绫的美:

縠绫縠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

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缭绫的织染技艺是多么的高妙!

白居易还有一首《红线毯篇》,描述了唐代高超的织毯工艺: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cuì,鸟兽的细毛)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纺织是民间最普通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纺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东道节度使,招募军中未曾娶妻者,资助他们到北方去,娶纺织能手为妻,带回越州,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州风俗变化,绫纱越织越精妙,逐渐声名远播。范文澜先生说:“这是交流技艺的一项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306页)

(二)繁荣兴盛的商业

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繁荣的商业大都会之一。这里不仅有封建时代的“超级市场”,而且有遍布全城的商业摊点。

封建时代的“超级市场”——东市、西市

长安城内设有直接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两个大规模商品交易市场——东市和西市。东、西两市各占两坊面积。每个市场长宽各约一千米,面积大约一平方公里。

两市之内东西向与南北向各设两条街,成“井”字形,分为九个区块,每块四面临街,便于开设店铺。《长安志》卷八说,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武宗时,来长安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说,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东市失火,烧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店铺。以此折算,一行约有三百家,东市二百二十行,约有七万家商店,足见当时市场之繁荣。

西市由于靠近漕河和永安渠,交通便利,加上“丝路”畅旺,因而西市见诸记载的有衣行、肉行、鱼行、药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金银行(又称金市)、铁行、秋簪行、坟典肆(书店)、波斯邸(波斯商人开的酒店)、寄附铺(当铺)等各种行业。经营门类齐全,商品种类繁多。

遍布全城的商业摊点

唐都长安除东、西两市外,在全城坊里之间,几乎到处都有商业摊点。如颁政坊有馄饨曲,靖恭坊有毡曲。“曲”是坊里中的小巷。“某某曲”,即经营某行业或某品类的集中地。崇仁坊多乐器店,延寿坊多琢玉店。胜业坊有蒸饼店,而辅兴坊的胡饼店最负盛名。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丹凤门外有一家饮食店,名叫“张手美家”,每个节日都有独特的食品供应。元旦有“元阳齋”;人日(正月初七)有“六一菜”;上元节(正月十五)有“涅槃兜”,又有“油画明珠”;端午节有“如意图”;腊八节有“法王料斗”……真是别出心裁,花样繁多。《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在长安长大的,他记述长安的著名小吃如数家珍:

萧家馄饨,漉去汤可以煮茶;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毕罗(抓饭?),其色不变。

唐长安食品“专业户”的烹饪技艺之高妙绝伦,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商业文明之发达繁盛,亦可想见。

三、唐都长安的文化

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将唐都长安的都市文化推向了我国封建时代的巅峰。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乐园。文化大师层出不穷,群星璀璨;文化产品硕果累累,争奇斗艳,光照千古。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对诗歌、美术、书法略作介绍。

1. 唐诗、唐代大诗人与唐都长安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所编《全唐诗》收诗 48900 余首,作者达 2000 余人。自成一家的大诗人即可举出数十人,其中最著名者,唐初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盛唐有贺知章、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中唐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晚唐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

上述大诗人一生或长或短都在长安住过,并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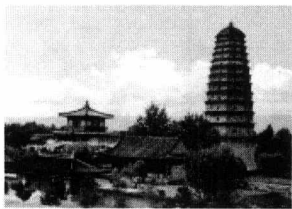
李白于天宝元年(742)来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诗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难篇》)后赞叹说:你是个下凡的仙人(“谪仙人”)呵!李白从此声名大振。李白在长安待的时间很短,但他对长安可谓一见如故,一往情深,一生都深深眷恋。后来虽被赶出长安,仍念念不忘。他一再吟哦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还发挥其特有的神奇想象,期望有一场大风,将他的心吹到长安城里,一解相思之苦。他也知道,帝王之乡城垣高大,戒备森严,他的这颗活蹦乱跳、不大遵守清规戒律的心,要借着风力飞进长安,也难乎其难——不得已而求其次,将我这颗心吹到离长安不远的咸阳,把它挂在咸阳城头的老树杈上,让我远远地瞥上几眼我那魂牵梦绕的长安也好啊!他在诗中咏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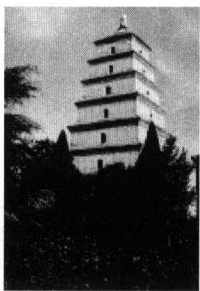
李白像

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身不能到,心向往之。长安在李白的心目中,绝不仅仅是谋取世俗显达的目的地,而且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灵魂的安顿之所。



法门寺



大雁塔



小雁塔

王维于开元九年(721)进士及第入住长安,不久担任太乐丞,名震长安文坛在李白之前二十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被放还民间。王维则始终在长安任高官,文名盛极一时。他同李白一样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诗同为千古绝唱。但王维虽然长住长安,他的诗作,直接涉及长安的却极少,他所描绘的大部分场景、风物,都在离长安百十里开外的蓝田辋川,或者终南山等处。与李白相映成趣的是:在城外的李白想进去,在城里的王维却想出来。钱钟书先生发现的“围城”现象,至少在唐代文化人的身上,已经明显地存在了。

“诗圣”杜甫的文化生命,比“诗仙”李白与长安的情感纽带似乎缠绕得更为密扎牢实。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晚。他的诗流传至今的共1400余首,其中有200多首写于长安。诗人不仅住在长安时热爱长安、歌颂长安,离开长安后,仍然依依眷恋,用许多笔墨抒发他对首都长安和祖国前途的关切之情。杜甫流落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写的“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等诗句,就是这种情思的深沉流露。直到公元770年临去世前,杜甫还异常沉重地吟叹道:“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假如大地有耳,假使苍天有情,它们听到杜甫如此厚重沉郁的咏叹,不知作何感想?有何反应?不知它们有没有心跳?有没有动情?

长安的文化个性是多层面的。它对于所有的文化人并非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年年辈辈总显示同一张面孔。它对他们有冷漠、有拒绝、有挤压、有伤害,但也有召唤、有接纳、有温情、有拥抱。姗姗来迟的白居易青年时代就受过长安城给他的这份礼遇。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有一位身材瘦小的乡村青年来到长安,以诗歌求教当时的大诗人、著作郎顾况。顾况看到谒帖上署名“白居易”三字,傲慢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他读到白居易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诗时,大为惊叹,忙改口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顾况态度的改变,形象地说明,唐都长安的宽厚臂膀,是,至少有时是乐于拥抱、吸纳新鲜空气的。这或许正是它能成为诗的王国的秘密所在吧。